

三重转型、社会风险与福利国家： 构建包容性三重转型的分析框架

[韩] 崔荣骏

[摘要] 当前福利国家正经历着人口结构转型、数字化浪潮以及气候危机的深刻冲击，步入结构性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三重变革不仅相互关联，更要求社会超越被动应对，转向积极主动的政策干预，以推动社会向更加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基于这一立场，本文提出“三重转型”（triple transition）概念框架，分析人口、数字与气候三大转型的主要特征与核心议题，并探讨其相互交织的影响及整体意义，阐明推动系统性转型的必要性；并识别出不同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第三类社会风险”，构建了一个由变化引致风险、转型衍生风险与潜在未知风险构成的三层风险体系；之后提出以风险缓解、变化适应与机遇拓展为核心的应对战略，助力社会更有效应对三重转型带来的多重挑战；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方向与实践路径，旨在为构建一个惠及当代与未来世代、人人共享福祉的福利社会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 人口结构转型；数字化；气候危机；福利国家；社会风险

一、引言

当今时代正处于多重危机的交汇期。自 19 世纪英国工业化以来，曾经前所未有的“增长时代（era of growth）”如今正逐步迈入高度不确定的“后增长时代（era of post-growth）”。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数字化、气候变化与人口转型已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三大关键挑战与变革。这三个大趋势正同步演进，为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风险。人工智能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就已显现出超越人类智能的迹象，地球平均温度已突破比工业化前升高 1.5 摄氏度的临界值——这一现象被界定为“不可逆转的变化”。^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快速老龄化趋势加速推进，不仅引发了生活质量下降的担忧，也带来了财政负担日益沉重的风险。劳动市场结构的深刻调整已经成为现实，而不断重复发生且分布不均的气候灾害亦表明，这些变化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型，也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国家正积极应对这些变化，然而仍存在若干不足。第一，现有的应对路径往往忽视了三种变化之间复杂而紧密的相互作用。例如，人口减少虽具有缓解气候危机的潜力，但气候变

[作者简介] 崔荣骏，韩国延世大学行政学系教授、福利国家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比较社会政策。

^① Jeff Tollefson, "Earth Breaches 1.5°C Climate Limit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does It Mean?" *Nature*, 2025, 637(8047).

化却可能对生育率产生不利影响。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可能加剧青年失业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为老年人创造新的社会角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减少的负面效应。第二,虽然已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但缺乏具备中长期目标的“转型视角”。对人口变化的应对往往局限于提高生育率;对数字化和气候变化的应对则集中于科技发展和可再生能源推广,而较少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公民如何实现有尊严和有质量的幸福生活。尤其是,这三种变化均对个人收入、就业与照护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但从福利国家视角出发的系统性回应仍然不足。

在此背景下,仅依靠单一领域的问题解决策略难以实现互补与高效,应对能力也相对受限。因此,亟需从“三重转型(triple transition)”的整体视角出发,以应对这些复杂而交织的挑战。同时,有必要超越短期与临时性的应对方式,使这些变化成为对个人与社会而言具有明确目标、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转型”。然而,目前关于三重转型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来界定以气候、数字化与人口变化为核心要素的三重转型及其复杂相互作用机制。

本研究旨在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支持在三重转型时期有效应对社会风险并推进福利国家改革。首先,将界定“转型”的概念,并系统梳理气候、数字化与人口变化及其与转型之间的关系;其次,讨论气候、数字化与人口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阐明三重转型的概念定义及其重要意义;最后,在三重转型框架基础上,探讨福利国家应对新型社会风险的方向,并提出构建积极且综合的三重转型战略的政策分析框架与思路。本研究力求为应对三重转型所带来的复杂挑战、重构可持续且公平的福利国家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二、气候、数字化与人口变化的三重转型

(一) 变化与转型

1. 变化与转型的概念辨析

大多数研究在讨论气候、数字化和人口的变动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变化(change)”和“转型(transition)”这两个概念。现有文献往往未对其作出清晰界定,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现象。此外,不同学术语境下对这些概念的范围与内涵存在多样化的解释。因此,本文首先从区分“变化”与“转型”的概念开始。

“变化”的词典意义是指某个事物的状态或特性发生改变的过程。从宏观语境上来说,是指某一现象的平均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情况。例如,气候变化是指自工业化时期以来,由人类活动所引发的急剧气温上升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气候现象的发展。^①从这一意义出发,数字化是指原本以模拟形式存在的信息或服务变为数字形式的过程,并进一步指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工作和价值的重组。^②人口变化是指出生率、死亡率、移民等人口学状态随着时间变化的

① James R. Fleming, "Joseph Fourier, the 'Greenhouse Effect', and the Quest for a Universal Theory of Terrestrial Temperatures," *Endeavour*, 1999, 23(2).

② Peter C. Verhoef,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2.

现象。^①

与变化相比，“转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指的是带有目标性和路径性的变化以及应对方向。进一步来说，转型是指在系统层面上，伴随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中长期变化，并且以多层次行动者的有意介入为前提。^②在转型的语境中，气候、数字化、人口的转型包含了问题的解决和系统性的应对方案，通常以实现更优状态的改善为目标。例如，如果说气候变化是指自工业化以来地球温度上升所引发的各种环境现象，那么气候转型则是指在限制温度上升的同时，使个人和社会能够实现可持续生活。本文将通过区分“转型”与“变化”，提出“三重转型”概念，将其视为超越单纯变化、旨在实现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社会的有意干预。

然而，关于气候、数字化、人口三个领域中变化与转型的讨论极为复杂，不同研究者对其定义与分析方法各不相同，并且存在不少模糊之处。下文将明确三大领域中“转型”的概念。

2. 气候、数字化、人口转型的概念性定义

（1）气候转型

在气候领域，“变化”和“转型”的使用区分最为明确。“气候变化”在广义上包括周期性或非周期性发生的气候系统长期变化，其成因涵盖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③在现代气候政策语境中，“气候变化”通常以狭义使用，主要指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CCC COP）等国际气候协议，正是基于这一现代意义的气候变化，尤其关注与工业化前相比地球表面平均气温的升高幅度。^④气候变化的后果包括粮食与饮用水短缺、^⑤公共健康与生活质量下降、居住地与社会基础设施风险增加，^⑥以及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一系列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⑦

与之相对，“气候转型”是指为减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将其转化为发展机遇而开展的社会经济应对行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将“气候转型计划（climate transition plan）”定义为“履行气候相关公共承诺的行动计划”，并对其战略与具体措施作出说明。^⑧气候转型的内涵包括碳中和目标、减排战略、排放量削减及公正转型等举措，^⑨并被认为是实

① Ansley J. Coal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1987.

② Federico Gobbi, *The Diffusion Process of Twin Transition: A Network Analysis of Italian Place Leadership*, Master of Science of Thesis in Management Engineering, Politecnico, 2022.

③ Stephen Seidel, Dale L. Keyes, *Can We Delay a Greenhouse Warm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Options to Slow a Build-up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ashington, DC, 1983, 33-36.

④ IPCC, *Climate Change 2023: Synthesis Report*, Geneva, Switzerland, 2023.

⑤ M. Melissa Rojas-Downing,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Livestock: Impacts,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2017, 16.

⑥ Andy J. Howard, et al., "Protecting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from Inland Flooding in the UK: Some Thoughts on Current Approaches to Asset Management in the Light of Planning Policy, Changing Catchment Hydr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Policy & Practice*, 2017, 8(2).

⑦ James R. Fleming, "Joseph Fourier, the 'Greenhouse Effect', and the Quest for a Universal Theory of Terrestrial Temperatures," *Endeavour*, 1999, 23(2).

⑧ EPA, *2024-2027 Climate Adaptation Plan*, 2024.

⑨ Emma Jones, et al., *Climate Transition Tool 2.0: Bridging Gaps, Enhancing Sectoral Scope, Highlighting Performance Links*, https://www.goldmansachs.com/pdfs/insights/pages/gs-research/climate-transition-tool-2_0/report.pdf.

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键路径。^①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公正转型旨在向低碳与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确保无人被边缘化，实现社会与经济正义。^②这一概念最初源于保护因环境管制而失业的劳动者权益，但随后扩展到受影响社区、利益相关者及广泛参与过程，并进一步纳入对碳排放责任较大主体的约束性要求。

（2）数字转型

关于数字化，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是“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数字转型不仅仅是将模拟数据数字化，而是指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根本性地变革组织、商业模式乃至整个产业的过程。这一概念与“转型”的内涵高度相似，其共同点包括：涉及中长期的复杂变化、需要多层次行动者的介入，以及以创新为路径实现经济价值的目标。然而，迄今为止，数字转型概念大多围绕商业和经济价值展开讨论，对数字化可能带来的个人与社会的各种社会经济负面影响的讨论仍较为缺乏。

部分研究使用“转型”这一术语将研究焦点放在数字化对社会的影响上。狭义上，数字转型通常指的是企业或组织内部发生的数字化过程及其结果；而广义上，它被理解为数字技术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带来的变革与影响。有学者将数字转型定义为：基于知识的数字表达与计算能力，在基础设施、服务、应用程序与人类行为等多个社会层面所发生的变化过程。这一定义虽然扩展到了社会领域，但在目的性方面仍显不足。^③

与此相对，有研究将数字转型定义为对经济与社会结构产生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其论述不仅关注到生产率提升，还延伸至数字技术对经济组织及社会整体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他们从“数字技术影响政治、商业、生活习惯、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强调应当将数字技术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并将赋能公民与企业作为其目的。^④世界银行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表述。该报告在教育领域指出，数字转型应超越单一介入，构建一个政策驱动（policy-driven）、系统性（systemic）并具有明确目标（fit-for-purpose）的数字路径。^⑤

（3）人口转型

人口变化基本是指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同时也包括通过国内外迁移等方式所引起的人口相关现象的变化。^⑥近年来，关于人口变化或波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以及移民等核心议题上。相对而言，人口变化与人口转型并未被明确区分使用。

在既有研究中，“人口转型”被用来表示在社会从传统状态转向高度现代化状态的过程中，

① Fuso Nerini, et al., "Connecting Climate Action with Oth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19, 2(8).

②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Just Transition*, 2023.

③ Dæhlen Morten, *The Twin Transition Century: The Role of Digital Research for a Successful Green Transition of Society? The Guild of European Research-Intensive Universities and Bern Open Publishing*, 2023.

④ Muench Stefan, et al., *Towards a Green and Digital Future*,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2022.

⑤ Rajasekaran Subhashini, et al., *Digital Pathways for Education: Enabling Greater Impact for All*, World Bank, 2024.

⑥ Bongaarts John, "Hum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09, 364(1532).

人口再生产方式所发生的特定变化；^① 也被用来描述从具有高变动性的死亡率与出生率的传统人口体制，转向具有相对低且稳定的死亡率与出生率的现代人口体制的历史性变化。^② 近年来，人口转型的讨论也开始将移民的流入视为一个重要变量，并作为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所带来经济冲击的方案加以探讨。^③ 人口转型模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 model）的演变展示了这一人口转型的阶段。其基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两个人口特征的历史人口趋势，提出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整体人口增长率将经历五个阶段的变化。^④

但前文所提出的具有明确意图和目标的“转型”路径，在学术层面尚缺乏充分探讨。与人口变迁（demographic change）相比，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不仅是对变化状态的描述性概念，更强调将人口变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引导至更加理想的方向。事实上，即使出现人口变动，其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也会因经济、就业、性别平等、社会融合与再分配等政策安排的差异而显著不同。因此，人口转型的关键在于，能否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确保社会中所有主体实现稳定且可持续的生活。

（二）从人口转型视角看三重转型

1. 三重转型的概念与必要性

三重转型的起点在于认识到人口转型、数字转型与气候转型并非彼此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相互交织的结构性变革，并且在某些情境下产生张力，呈现出一种融合性和综合性的特征。三重转型可界定为个体、企业、社会与国家有意识地推动的一种战略性过程，其目标是迈向更加可持续、公平、包容与正义的未来。这一概念旨在综合理解人口变动、数字化与数字转型、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措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系统性的转型努力。为了有效应对三重转型，需要采取三重战略：第一，降低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第二，提升主动适应变化的能力；第三，最大限度地利用潜在机遇。这种复杂转型既带来协同增效的积极作用，也伴随新的政策难题和结构性挑战，因此必须采用整合性与交叉性的分析视角和应对路径。

将三种转型视为一个整体的“三重转型”框架，而非各自为政的单一转型，其必要性可从“制度互补性”理论中找到依据。制度互补性指两个或更多制度在相互独立运行时未必表现良好，但当它们之间具有互补关系时，则能够产生更优的绩效。^⑤ 此时，制度间的联动性与协调性增强，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制度体系，从而带来更佳的结果。无论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还是“福利国家体制论”，均强调当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具有互补关系时，其实施效果会更加显著。相反，缺乏互补性的政策组合往往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甚至导致政策失败。这表明，如

① Ansley J. Coal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John Eatwell, et al. (eds), *Social 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1989.

② Castree Noel, et al., *A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③ Dyson Ti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0.

④ Roser Max,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hy I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 Temporary Phenomenon?* Our World in Data, 2023.

⑤ Peter A. Hall, Daniel W. Gingerich,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Macro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MPIfG Discussion Paper, 2004.

果某项制度改革破坏了既有制度之间的互补结构,反而削弱整个系统的有效性。^①三重转型同样如此,若三者之间的政策改革缺乏互补性,向理想未来转型的进程就会受阻,甚至偏离预期目标。因此,每一项单一转型的改革都应与其他两个领域的改革形成协同关系,否则不仅可能重新回到旧体制,还引发一系列负面的后果。

此外,三重转型视角还包含以下特征:第一,需要超越单一的国内视角,建立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分析框架。无论是人口、数字还是气候议题,仅凭一国内视角都难以引导理想的转型方向。第二,必须关注由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共同作用所引发的系统性变动,并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应对策略。例如,人口减少可能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下降,而数字化则可能加剧就业岗位流失,但二者如何交织演化,其路径极难预测;第三,转型本质上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有意干预过程,且涉及多层次行为主体(multi-actor),因此需要构建多层次参与的治理架构,以确保应对策略的有效实施。

2. 人口转型的扩展

为说明三重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以当前最具紧迫性的人口转型视角作为分析出发点。首先,有必要将人口转型的分析框架,从单纯的“人口变迁”视角拓展至具有明确政策目的的社会经济视角。在韩国现代史上,曾有过两次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人口转型尝试。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后期,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家庭政策为代表,其目标在于通过减少子女数量,提升包括子女在内的家庭成员生活质量。这一人口转型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②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与个体层面的生活质量提升实现了双重达成,因此,这一时期的第一次人口转型可被视为成功的典型案例。然而,进入21世纪后,在应对“低出生率冲击”时,人口转型反应明显滞后,相关政策的数量与质量均未达到充分水平。从更为根本的层面看,国家所追求的“提高出生率”目标未能与个人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目标相契合,最终未能获得公众的广泛共鸣。

那么,人口转型的核心议题是否仅在于“保持人口结构的稳定”?当前人口转型的方向主要集中于提高出生率,以维持人口总量的稳定。然而,维持人口规模并非最终目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障“劳动力数量”。换言之,当前人口政策的重点在于防止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持续减少,而这一目标背后所隐含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的可持续性”。从这一视角来看,即便劳动适龄人口有所下降,只要青年、女性和老年群体的就业率得以提高,有关“劳动力短缺”的担忧也可以显著缓解。

正如图1所示,在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即老龄化率)显著上升,但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几乎没有下降。这表明,女性和中高龄群体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龄人口比例快速上升的影响。换言之,低出生率导致的老龄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减少。将韩国与丹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15—24岁青年群体中,丹麦的就业率几乎是韩国的两倍,显示出韩国青年劳动市场参与率明显偏低。此外,

① Boyer Robert, "Coherence, Divers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s—the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Hypothesis,"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2005, (2).

② 윤영근, 정책증거의 시차에 관한 연구: 산아제한정책사례의 적용, 행정논총, 2013, 51(4).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存在约 15% 以上的差距，丹麦明显高于韩国。引进移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增加人口数量，但更直接的作用在于增加实际从业人口数量。由此可见，人口转型不仅应关注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增加这一“人口结构”维度，更应重视反映经济活动人口与非经济活动人口比例的“就业结构”，并将其纳入人口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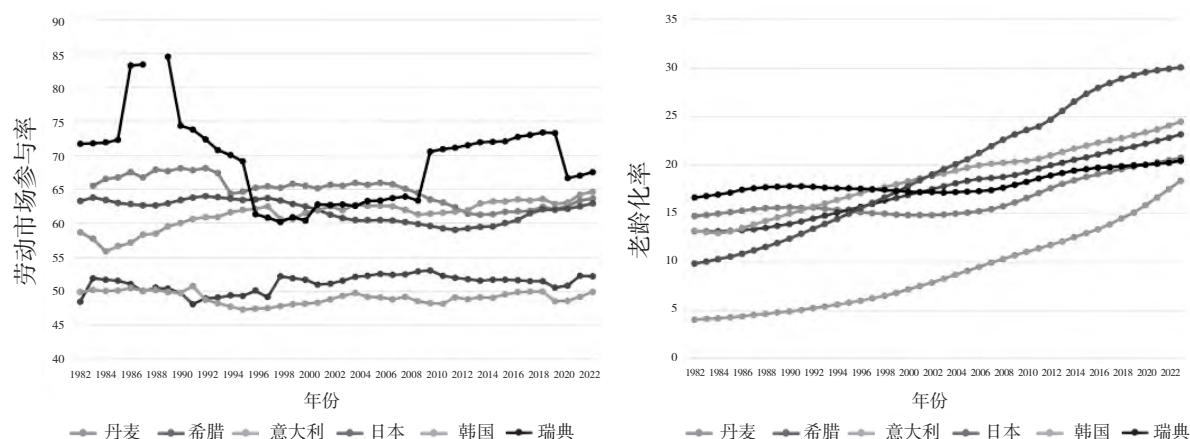


图 1 主要国家 15 岁以上人口劳动市场参与率与老龄化率 (%)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24 年相关数据。

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劳动参与率同等重要的另一个维度是“生产率”。例如，在一个由 10 名劳动者生产 10 件产品的社会中，即使劳动人口减少至 5 名，只要这 5 名劳动者仍能生产 10 件甚至 20 件产品，就可避免因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冲击，反而使人均可享受的经济财富进一步增加。由此可见，即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市场参与率降低，只要生产率得以提升，就能够减轻经济压力，甚至提高个体所能享有的财富。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生产率可被视为人口转型中的关键维度之一。基于对韩国经济活动参与率和生产率变化情景模拟的研究显示，即使到 2047 年经历剧烈老龄化，只要整体经济活动参与率和生产率同步提升，以 2022 年为基准（指数为 100），2047 年的人力资源规模指标仍可提升至 109。^① 该结果表明，与其单纯关注劳动力数量，不如更加重视生产效率与参与程度对经济可持续性的影响。

人口转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维度是“再分配”。即便生产率提高、产出总量增加，如果生产成果被少数人垄断，且未能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合理分配，就难以实现理想的人口转型目标。举例而言，即使 5 名劳动力能够生产 20 件产品，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市场高度两极分化的条件下，仍可能出现 3 人生产 15 件、2 人仅生产 5 件的情况，同时还存在 5 名非经济活动人口依赖他人供养。因此，一个社会的产出成果能否公平分配，是衡量人口转型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在数字化背景下，“赢家通吃”型经济结构极易进一步加剧不平等，而这些“赢家”往往也是碳排放较高的群体。因此，在数字化与气候危机交织的三重转型背景下，再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不容忽视。

人口转型最为明确且短期的目标是通过提高出生率实现人口增长，然而仅凭这一视角难以

① 이철희, 노동수급 불균형 전망과 대응 과제. '축소사회와 삼중전환: 노동, 복지 정책의 과제' 인구전환포럼. 국회미래연구원, 2024.

引导出理想的人口转型。尤其是,关于人口增长如何提升生活质量的因果机制解释并不充分。此外,从现实角度看,通过鼓励生育来维持人口结构本身并非易事。因此,新的政策目标应当聚焦于如何在不引发剧烈社会冲击的情况下,实现人口减少社会的平稳过渡,同时提升个体生活质量并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转型必须明确提出:如何通过提高出生率与增加移民数量,使青年及劳动年龄人口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进一步而言,要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还需要在超越人口领域的多个政策领域同步推进变革。

3. 从人口转型视角看三重转型的相互作用

从人口转型的视角来看,仅以“如何增加人口数量”为核心问题的未来应对方式存在明显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将关注点从人口的“量”转向“质”。虽然增加移民人口可以作为一项可行的方案,但仍需在政策层面将已然确定的人口减少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新常态”,并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在这一背景下,从社会投资的角度推进应对具有重要意义。只要能够促进成年人和老年群体的积极就业,就能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在总体上提升社会的适应能力与可持续性。

此外,数字转型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数字转型,正因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及类人机器人的应用而进入新阶段。高盛的研究报告显示,“通过对美国和欧洲各类职业任务的数据分析发现,目前约 2/3 的岗位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于 AI 自动化之下,而生成式 AI 最多可替代现有工作任务的 1/4”。^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预测。^② 换言之,针对人口减少带来的担忧,有必要同时考虑数字转型所引发的岗位替代与生产率提升等因素。近期部分研究指出,在人口老龄化转型较快的国家,自动化进程往往推进得更为迅速。^③

优质岗位越多,岗位减少现象反而越显著的“莫拉维克悖论 (Moravec's paradox)”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④ 考虑到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这种担忧会加重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即便青少年的数量持续下降,争夺优质岗位的竞争却愈发激烈。事实上,尽管过去 20 至 30 年间青少年的数量不断减少,但教育竞争却日益加剧,每户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支出持续上升,这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在此背景下,青年群体极易产生更强的挫败感,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而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技术压力 (technostress) 则会诱发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焦虑 (AI anxiety) 与抑郁。进一步而言,数字化所导致的青年不稳定性上升,也容易对其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数字时代与个体的社会孤立和孤独现象密切相关。^⑤ 非面对面社会的发展以及数字设备的普及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际关系结构,从而导致青年群体的孤立与孤独感持续上升。^⑥

① Jan Hatzius, et al., *The Potentially Larg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conomic Growth*, Goldman Sachs, 2023.

② Cazzaniga Mauro, et al., *Gen-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Wor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4.

③ Acemoglu Daron, Pascual Restrepo, "Demographics and Auto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2, 89(1).

④ Jan Hatzius, et al., *The Potentially Larg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conomic Growth*, Goldman Sachs, 2023.

⑤ Noreena Hertz, *The Lonely Century: How to Restore Human Connection in a World That's Pulling Apart*, Crown Currency, 2021.

⑥ 최영준 외, 청년의 고립은 얼마나 사회적 비용을 발생시킬까요?, 청년재단, 2023.

这种现象并非韩国独有，在西方国家同样具有普遍性。例如，2020年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在18至25岁的青年群体中，有63%报告经历了严重的焦虑或抑郁症状。^①英国的“社区生活调查”结果亦表明，感到最孤独的群体并非老年人，而是16至24岁的青年群体。同样，社会关系弱化的青年往往对恋爱或婚姻持消极态度，甚至可能回避生育。^② 这些问题容易导致与强调人口“质”的转型方向相悖的结果。在老年群体中，如果缺乏数字技能，数字化会进一步加剧老年贫困与收入不稳定问题；^③ 此外，数字鸿沟还导致对老年人的社会排斥，并对其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④

然而，如果数字化转型得以成功实施，可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数字技术可以缓解如照护或孤独感等与生命周期相关的多种困难。^⑤ 例如，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孤立与孤独问题，并提升其身心健康。^⑥ 近年来，如独居老人应急安全服务系统或搭载人工智能的互动型玩偶等，即为此类数字技术应用的例证。未来，类机器人的投入应用，有望进一步放大数字化的积极效益。此外，数字转型也能成为创造新型数字岗位的动力来源；通过预判劳动力减少的趋势及其影响领域，有助于将对社会经济的冲击降到最低。

气候转型同样与人口转型密切相关。气候变化会增加因热相关疾病或突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热相关疾病在老年人、单人家庭或居住环境恶劣的人群中尤为常见。而有趣的是，人口转型的结果之一就是老年人口与单人家庭的比例上升。因此，当气候变化与人口转型交织时，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性风险。例如，在极端高温或严寒的情境下，能源使用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高额成本导致部分人无法获得足够的能源使用，或因能源支出占比过高而严重削弱其他生活消费能力，从而引发“能源贫困”问题。除此之外，气候变化还会引发粮食供应问题、价格上涨、营养失衡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突发性传染病或昆虫传播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会增加。^⑦

更为根本的是，气候危机及其引发的“气候焦虑”极易显著削弱人们的生育需求与意愿。已有研究表明，气候焦虑会对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生育意向产生负面影响。^⑧ 相关调查显示，青年群体对气候危机的焦虑水平较高，其中约40%的人表示因气候焦虑而降低了生育意向。同时，还有研究发现，在经历极端气候事件后，当地的出生率出现下降趋势。Thiede等和Hajdu的研究进一步证实，高温高湿的酷热天气对出生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验证了气

① Richard Weissbourd, et al., *Loneliness in America: How the Pandemic Has Deepened an Epidemic of Lonelines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Harvard University, 2021, 1-13.

② 최영준 외, 청년의 고립은 얼마나 사회적 비용을 발생시킬까요?, 청년재단, 2023.

③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Reporting Climate Resilience: the Challenges Ahead*, 2018.

④ Chee Shi Yin, "Age-related Digital Disparities, Functional Limitations, and Social Isolation: Unraveling the Grey Digital Divide between Baby Boomers and the Silent Generation in Senior Living Facilities," *Aging & Mental Health*, 2024, 28(4).

⑤ 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Gender Equality Index 2020: Digital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0.

⑥ Keya Sen, et al.,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for Social Wellbeing Reduces Social Isolation in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SSM-Population Health*, 2022, 17.

⑦ IPCC,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Geneva, Switzerland, 2022.

⑧ Clayton Susan, "Climate Change and Mental Health," *Curr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Reports*, 2021, 8(1); Caroline Hickman, et al., "Climate Anxiety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nd Their Beliefs about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 Global Survey,"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2021, 5(12).

候变化与人口结构变动之间的紧密互动。^①与此同时,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难民”问题也正在成为新的社会挑战。^②

如果我们无法实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之上 1.5℃ 以内这一气候危机的“最后防线”,许多学者预测极端气候现象将进一步加剧。若人们认为子女未来将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且恶化的环境中,他们更可能选择不生育。此外,在极端不稳定的气候不断扩散的背景下,“维持人口规模是必要的”这一主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逐渐丧失。

气候转型的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果各国依据《巴黎协定》实施旨在将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或 2℃ 以下的气候转型政策,在短期或中期内,个人和企业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GDP 出现下滑,传统依赖化石燃料的产业遭受较大冲击,相关就业岗位也会直接受到影响。为实现碳中和而对传统农业或制造业征收碳税,会加重小微经营者的经营压力;而能源抑制政策则易推高能源价格,在气候变化快速加剧的情况下,能源贫困问题也会进一步恶化。总体来看,此类气候危机与气候转型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为稳定的人群影响较小,而对青年、老年等经济弱势群体的冲击则更加明显。此外,低收入家庭往往难以承担不断上升的能源支出,而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及中高年龄劳动者由于难以及时掌握新的技能,会面临更大的适应压力。

与数字转型类似,气候转型同样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若能够前瞻性地创造气候转型所需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就业岗位,不仅不会加剧社会风险,反而能降低风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容易增加能源消耗,从而加剧碳排放,这揭示了数字转型与气候转型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尽管如此,绿色技术的发展被普遍认为对缓解气候危机具有积极作用。^③此外,研究表明,远程办公等数字技术的应用,通过减少通勤和缩短工作时间,也对气候危机的缓解做出贡献。^④有学者指出,清洁能源技术在建筑与改造工程中的应用,有望创造数百万个新的就业岗位,这表明气候转型与数字转型在促进就业方面有望发挥积极作用。^⑤归根结底,各类转型能否得到有效应对,将直接影响三重转型的成败。

前述讨论呈现了现有学术研究中关于三重转型相互作用的证据。三种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因各国的制度与结构背景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强化特定的社会风险,在其他情况下将风险转化为机遇,甚至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新风险和新议题。

① Brian C. Thiede, et al., "Climate Anomalies and Birth Rates in Sub-Saharan Africa," *Climatic Change*, 2022, 171(1); Tamás Hajdu,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Birth Rates in Europ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24, 46(1).

② Entwisle Barbara,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New Insights from a Dynamic Model of Out-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125(6).

③ Dong Feng, et al., "How does Digital Economy Affect Carbon Emissions? Evidence from Global 60 Countrie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2, 852.

④ Kyle W. Knight, et al., "Could Working Less Reduce Pressures on the Environment? A Cross-national Panel Analysis of OECD Countries, 1970–2007,"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 23(4).

⑤ Benjamin K. Sovacool, et 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t-zero Transitions: Policy Drivers, Barriers, and Justice Benefits to Decarbonization in Eight Carbon-neutral Countr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3, 347.

三、三重转型、社会风险与福利国家的应对

当三重转型超越短期性的政策应对，并以公平、包容与可持续性为目标时，福利国家将成为极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基于这一视角，本部分旨在识别三重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并探讨福利国家在应对这些风险中的作用及其分析框架。

（一）三重转型与社会风险

1. 传统社会风险与新型社会风险

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风险与引发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业社会的出现密切相关。应对传统社会风险的福利国家主要集中于对工业社会中制造业工人及其家庭的保护。特别是，为了维持家庭支柱的收入与健康而建立的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工伤补偿制度和医疗制度构成了核心；而在家庭支柱缺位或无法从事收入活动的情况下，遗属和残疾人养老金及公共救济则发挥了补充作用。^①换言之，以家庭支柱的收入和健康为核心而建立的制度，即福利国家最初的四大社会保险与公共救济体系。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两个特征。^②首先，以家庭为代表的传统非正式机制在缓解个人社会经济风险中的作用明显减弱。换言之，已趋向原子化的家庭在城市社会中对市场风险的保护功能大幅减弱。其次，与工业社会就业相关的新型社会风险开始出现。退休与失业并非农耕社会所固有的特征，在农耕社会中，人们无论年龄或性别，只要有能力就会从事劳动；而退休与失业则是工业社会的新发明。

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向以服务经济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转型，新型社会风险开始显现。以男性劳动为主的重工业衰退、生产率增长乏力的服务经济兴起，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并进入劳动市场等，构成了重要的背景性变化。有研究指出，在后工业社会中，新型社会风险包括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困难、传统家庭弱化与新型家庭形态出现、技能退化以及社会保障不足等多重风险情境。^③

新型社会风险主要集中在女性、青年、老年人等技能不足的群体，以及包括移民在内的少数族群。在工业社会，现金性社会保障作为保护工人的核心制度，构成了传统福利国家的基础；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随着女性广泛进入劳动市场并伴随人口老龄化加速，工作与生活平衡及照护问题逐渐凸显为核心社会风险。具体而言，在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双职工家庭成为常态的社会结构下，涵盖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照护成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此同时，快速的技术迭代缩短了技能更新周期，使得仅凭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已无法保障终身就业的可持续性，“技能退化”问题因而凸显，促使社会政策亟需建立新的应对机制。为应对上述新型社会风险，各国开始认识到传统“四大保险”和公共救济制度的局限性，在照护领域推

① Kananen Johannes, Peter Taylor-Gooby, "Public Attitudes and New Social Risk Reform," in *Politics of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 Routledge, 2007.

② Holzmann Robert, Steen Jørgensen, "Social Risk Management: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ocial Protection,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01, 8(2).

③ Bonoli Giuliano,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Social Policies: Providing Coverage Against New Social Risks in Mature Welfare States," *Policy and Politics*, 2005, 33(3).

进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并在技能培养方面实施更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不仅带来了社会风险的重大变化,也对个人与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人口转型。研究表明,在工业社会中,男性家长制盛行且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但出生率相对较高;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工业化水平较高、男性家长制仍占主导且女性就业率较低的南欧与东亚国家,出生率普遍偏低;相反,在女性社会参与更为活跃的国家,出生率却相对较高。这一现象表明,深入理解社会风险的演变特征,并推动社会结构变迁与政策体系的互补发展,对于准确把握人口转型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2. 第三类社会风险

三重转型所带来的复杂社会经济变化正在创造出“第三类社会风险”。我们在新冠疫情的经历中已预见并触发了这种新型社会风险的出现。虽然新冠疫情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卫生危机,但其影响并不仅限于感染者数量的增加。事实上,由新冠病毒引发的感染和死亡与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密切相关,社会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这种风险的影响。^①随着社交距离政策的实施和自发性聚会的减少,相关行业从业者不得不面临失业或无薪休假,从而导致收入下降。比失业威胁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去技能化”。与后工业化时期逐渐削弱技能效用的“技能退化”不同,新冠疫情带来了技能突然失去效用的剧烈变化。当非面对面的经济活动骤然兴起,那些无法转型为线上形式的职业便失去了市场需求。文化界和旅游业等领域的从业者如飞行员、导游等便是典型代表。另一个新兴的社会风险是社会关系的恶化。虽然社会关系问题并不是从新冠疫情开始的,但疫情无疑加剧了这一问题。大流行不仅削弱了日常的社会交往,也增强了人们的孤独感、隔离感乃至对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②由于社交距离和自我隔离等措施,社会联系被切断,压力和焦虑加剧,进而削弱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③

虽然在新冠疫情中显现的社会风险并非全新,但可以认为,在当前宏观变革背景下,这些风险正逐步演化为“第三类社会风险”。正如工业化催生了传统社会风险,服务经济扩大了新型社会风险一样,以疫情为契机进一步加速的数字化进程,以及与其相互作用的转型,极易使这一风险结构趋于固化。以平台劳动扩散所引发的劳动市场根本性变革便是典型例证。此外,从语言模型向与机器人技术结合的“物理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使传统技能越发失去效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不仅对以职业培训和再教育为核心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提出了根本性挑战,也对依赖化石能源的传统产业从业者产生“去技能化”的冲击。这些变革与人口变化相互叠加,其结果将如何塑造新的社会风险,以及对哪些群体的收入与就业产生影响,目前尚难以准确预判。

健康与照护相关的社会风险同样会演化至新的层次。Haidt的《焦虑的一代》等聚焦数字化

① Rachel E. Jordan, et al., "Covid-19: Risk Factors for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BMJ*, 2020, 368.

② Matias Carvalho Aguiar Melo, et al., "Impact of Social Distancing on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Urgent Discu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2020, 66(6).

③ Noreena Hertz, *The Lonely Century: How to Restore Human Connection in a World That's Pulling Apart*, Crown Currency, 2021.

的研究，以及有关气候焦虑的文献均指出，这些结构性变化对孤独感和社会关系产生显著影响。^①人口结构变动将导致老年家庭与单人家庭数量的增加，而这些群体在面对数字化与气候变化的负面冲击时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不仅增加了照护需求者的数量，也显著提高了照护者的社会风险。少数子女或家庭成员往往不得不长期承担起对慢性病患者、精神健康障碍者以及残障人士的照护责任；由此一旦无法参与劳动市场，便可能面临收入损失和职业技能退化的双重风险。近年来“青少年及青年家庭照护者”的案例表明，这类照护负担不仅与收入和技能风险直接相关，还可能导致“照护杀人”等极端事件的发生。更进一步，这些变化甚至可能通过激化政治极端化趋势，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产生潜在影响。^②

表 1 社会风险的构成与特性

	传统社会风险	新社会风险	第三类社会风险
结构变化	工业化	后工业化	三重转型
核心个体风险	收入和健康	+ 技能与照护	+ 孤独感与心理健康
核心政策对象	家庭支柱	劳动年龄人口	全年龄段
核心集体风险	集体消费	生产和再生产	转型关联
福利国家应对	社会保护：社会保险与公共救济	社会投资：社会服务与积极劳动市场政策	新型社会保护、社会投资及社会创新
福利国家目标	去商品化	去家庭化	生存与转型
应对体系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与市场	政府 + 公民社会 / 共同体
经济学范式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范式空缺与临时性取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 第三类社会风险的三层结构

为了对三重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进行更加精细且有效的政策应对，有必要深入理解社会风险的“三层结构”。第一层社会风险是指由三重转型时期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直接诱发的风险。例如，数字化扩展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超高龄化带来的照护需求激增，以及气候灾害引发的热相关疾病等均属此类。换言之，这些是因结构性变化而出现的紧迫性社会风险。应对这些风险，需要针对不同风险类型实施具体政策干预。

但是，除了由危机直接引发的第一层社会风险之外，为应对危机而制定的政策决策本身，会衍生出第二层社会风险。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过渡性规划与政策，意外地产生新的社会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中所提出的“人为制造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s）”概念，正是对类似问题的提醒。此处意指，旨在降低风险的干预，有时反而创造出未知的新风险。例如，为改善劳动者生活而实施的最低工资上调，加剧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困难；为减少碳排放而压缩化石燃料能源使用，会推高失业率。因此，在设计与规划针对第一层社会风险的政策时，有必

① Jonathan Haidt,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Penguin, 2024.

② Noreena Hertz, *The Lonely Century: How to Restore Human Connection in a World That's Pulling Apart*, Crown Currency, 2021.

要预判可能派生出的第二层社会风险，并将互补性的政策措施同步纳入其中。

除了前述的第一层和第二层社会风险外，还存在第三层社会风险。三重转型时期社会风险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高度不确定性。这不仅仅是“已知的未知”——即我们知道存在风险，但并不清楚其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发生；还可能出现“未知的未知”——即我们既无法界定风险的具体内容，也无法预测其发生时点。尤其是在多维度转型同时推进，且气候变化或数字化沿着难以预测的路径演进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尚未被识别的新型社会风险。这类第三层社会风险难以通过事先制定的政策加以应对，因此，必须建立并维持能够灵活、即时响应此类不确定且无法预期风险的治理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社会风险正在从传统社会风险向第三类社会风险不断演化。然而，并非是旧的风险完全消失、新的风险单独出现，而是既有风险与新的社会风险以物理的、甚至化学的方式交织与累积。同时，造成风险的不仅是社会经济变动或危机本身，连为了应对这些变动而采取的转型努力本身也可能制造新的社会风险。此外，像大流行病这样的不可预测且广泛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因此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治理结构。

（二）三重转型的挑战与福利国家的应对方向

过去 20 年来，很多发达型福利国家以及部分东亚国家陷入低增长轨道，在三重危机的压力下缺乏方向感而呈现出“漂流”状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式微后，经济学领域的霸权出现真空，加以“特朗普主义（Trumpism）”为代表的国家间摩擦加剧，以及多数国家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正是这种漂流的典型象征。与此同时，各国往往停留于对短期危机的临时性应对，暴露出在应对气候、数字化与人口危机及其转型所带来的复合性社会风险方面的结构性局限。目前，对三重转型的系统性理解仍然不足，相关治理体系尚未建立，有时错失了三重转型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尤其是，个人与公民在三重转型中是核心主体，但缺乏从支持这些主体出发、以成功引领三重转型为目标的政策视角。因此，应对三重转型的政策战略必须围绕以下三个方向进行设计：一是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二是支持社会各主体适应新体制；三是充分挖掘并放大转型过程中的机遇。表 2 展示了围绕“降低风险 – 适应变革 – 放大机遇”这三个目标的战略示例。

表 2 三重转型的战略：减少、适应、机遇

类别	减少	适应	机遇
气候	脱碳战略：碳排放权、碳税及相关管制	新气候适应战略：防灾对策、居住政策、弱势群体援助	可持续增长战略：通过新能源产业等扩大新产业 / 就业
人口	增加人口战略：提高出生率、吸纳移民	应对人口减少社会的平稳过渡战略：扩大经济活动人口比重、提升生产率、强化再分配	均衡发展战略：通过数字转型与气候转型的积极结合，实现包容性社会转型
数字化	包容性数字战略：强化社会保障、引入社会创新、创造新型就业	社会投资战略：加强数字素养、增强社会关系	包容性高生产率战略：促进照护 / 福利服务的应用、缩短劳动时间并扩大休闲时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这些三重转型战略可进一步依据其性质划分为事后性、处方式应对与事前性、预防式应对，以及社会保护政策与社会投资政策。三重转型极易导致失业与收入减少：一方面，人口减少将

引发特定产业萎缩；另一方面，数字化与自动化会带来就业岗位的减少，而气候转型期间碳密集型产业的衰退亦将推动劳动市场结构的改变。与此同时，伴随数字化而快速发展的平台劳动等新型就业形态，要求对现有收入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重构。此外，老龄人口的增加与数字化趋势也要求持续扩展照护政策，不仅针对需要照护的人群，还包括提供照护的人员及其所在的社区。照护的重点应会从身体照护进一步扩展到心理健康照护领域。对于社会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养老金政策，压力亦将不断增强。

表3 三重转型时期的核心政策应对

	事后应对	事前应对
社会保护	困境缓冲器 – 强化应对失业 / 收入减少的政策与结构调整 – 扩大照护政策 – 可持续养老金政策	技能再培训安全网 – 强化地方社会 / 共同体 / 社会关系网 – 预防性地利用数字健康与福利技术 – 透明的算法与数据权利 – 支持工作时间缩减与岗位共享
社会投资	风险防护盾 – 为数字化与气候转型过程中的失业者提供再培训与转岗支持 – 针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创新 – 减轻社会孤立 / 孤独感的服务	能力增强器 – 扩大面向青年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 – 生活平衡型政策 – 提升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 – 投资于住房 / 交通等能源效率 – 扩展“数字与绿色就业”相关教育与投资 – 扩大健康 / 福利技术的公共研发（R&D）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于三重危机与转型所带来的风险，仅依靠社会保障已不足以应对，还必须同步推进社会投资型政策。其核心在于，在劳动市场重组过程中，通过技能再培训使个人能够重新进入收入性活动。随着数字化加快技能更新周期，从青年到老年群体，支持其维持既有技能并掌握新技能，将成为首要的社会投资政策。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为获得稳定就业岗位，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需要开展相当规模的研究与政策投入。实际上，一部分群体可能难以实现有效的再技能化，因此有必要通过多元化的社会创新，确保从事社会价值创造活动的人群能维持基本生计。减少社会孤立和孤独感的服务，一方面有助于相关群体重返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而具有典型的社会投资属性。

预防性功能同样至关重要。既有研究普遍指出，三重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加强社会关系。事实表明，拥有紧密社会联系的公民在应对气候灾害时更具韧性，在人口减少的时代，稳固的地方社区被视为重要替代方案；而数字化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常可通过强化社会关系得到缓解。因此，旨在加强地方社会与社区的各类政策在三重转型时期具有显著的预防意义。此外，为维护公众健康而应用的卫生和福利技术，也可被视为事前性的社会保障政策。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扩展，社会保障体系中对数字治理的依赖将进一步增强。然而，如果应用于数字社会保障的算法缺乏透明性与公平性，则易加剧对弱势群体的歧视。^① 因此，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公平分享优质就业机会，并有效缩短劳动时间。

① Virginia Eubanks, *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 St. Martin's Press, 2018.

预防性的社会投资政策至关重要。在进入人口减少时代后,要让包括儿童和青年在内的所有人口能够在高生产率领域或社会价值创造领域中发挥作用,必须采取提升数字素养的措施,并配合促进求职与转职顺利进行的教育和劳动市场政策。支持改善弱势群体能源效率的居住环境、开发和扶持绿色与数字就业岗位、提高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和就业规模,均属于预防性社会投资战略的范畴。另一个关键政策方向是扩大对健康与福利技术的公共研发投入,并构建一个确保所有人都能公平使用技术成果的政策生态体系。因为如果技术开发完全由民间资本垄断,会加剧技术使用的不平等。

为了推进符合这四大政策方向的战略,财政资源的筹措与再分配十分重要。通过代际再分配、代内再分配以及不同特征群体间的再分配,不仅可以确保公平性,还能为政策推进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然而,要实现有效的再分配,必须提升公众对政策与政治的效能感,同时增强社会的信任与团结程度。

总而言之,要实现三重转型,关键在于强化社会支持体系,并通过重构福利国家来提升社会的可持续性与包容性,同时实现公正转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适应,更需要从地方社区出发,构建以社会信任与社会连带为基础的综合性应对框架,并扩展至整个社会。

四、结论

我们正处于气候转型、数字化转型与人口转型这三大趋势交织的社会之中。这三重转型具有足以深刻改变人类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诚然,三重转型为社会创造了多样化的机遇,但同时也对个体与国家的可持续性构成了重大威胁。三种转型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在推动急剧的变革。因此,被动接受气候变化、数字化变革与人口变化,并以事后政策加以应对,不仅不可取,而且效率低下。相反,应当主动理解三重转型的相互作用,确立明确的目标与愿景,并实施前瞻性应对。基于这一视角,本文将“三重转型”界定为: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等多维度对气候转型、数字化转型与人口转型进行综合理解,并据此设计的一种有意图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引导个人、企业、社会与国家朝着更加可持续、公平、包容与正义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许多国家在应对人口、数字化与气候转型的过程中力不从心,困难重重。以韩国为例,无论是低出生率与人口老龄化,还是数字化与劳动力市场的变革,抑或是碳中和问题,都面临诸多挑战。以增长优先为导向的制度遗产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基调,使国家政策更加侧重于经济增长和市场驱动的发展战略,从而难以采取积极主动且预防性的应对方式。虽然这种战略在提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加剧了低出生率与气候问题,并使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排他性而非包容性的发展路径。此外,由于国家战略缺乏从“制度互补性”视角整合各类转型的整体性方法,因此在有效应对三重转型方面暴露出明显局限。

然而,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实现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三重转型战略与政策,必须伴随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国家的改革与扩展。这一观点与“通过压缩财政应对人口减少、为数字竞争容忍不平等以及将气候支出与福利支出视为零和关系”的立场存在根本差异。本文强调:通

过强化个人能力、促进包容和平等、增强社会连带与信任，可以进一步推动三重转型的实现。现有研究也表明，在气候转型表现良好的国家往往建立了更完善的福利体系。^①此外，即便在欧洲内部，与南欧国家相比，采取普遍主义福利体制的北欧国家在就业、创新和生产率等方面均表现突出。^②因此，提升个人生活质量和能力的福利国家更有可能实现成功的三重转型。

为了突破以“各自为政”为特征的收缩型社会，推动向以连带为基础的生态－福利国家与关系型社会的范式转变，必须充分理解三重转型，深刻反思现有体制的发展方向，并制定新的政策应对措施。三重转型不仅应被视为应对危机的工具，更应成为构建能够保障当代与未来各世代、各阶层共同福祉的社会，进而提升社会可持续性、公平性的关键过程。

Triple Transition, Social Risks, and Welfare Stat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n Inclusive Triple Transition

Young Jun Choi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03722, South Korea)

Abstract: Modern welfare state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driven by three interconnected mega-trends: demographic change, digitalization, and the climate crisi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triple transition" and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intentional and proactive interventions to move society towards a more inclusive,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future.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cor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each of the three transitions—demographic, digital, and climate—and explores their interwoven impacts and collective significance. It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treating these transitions as a unified phenomen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a new category of "third social risks" arising from these transitions, distinct from the risks encountered in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periods. The paper proposes a three-layered framework of social risks: risks due to changes, risks from transition processes, and unknown risks. This framework facilitates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emerging risks and enables the formulation of response strategies. Finally, the study outlines three core policy strategies—risk mitigation, adaptation to change, and opportunity maximization—to address the complex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triple transition. These strategies, combined with specific policy directions and practical interventions, aim to reconstruct welfare states, ensuring well-being and sustaina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contributing to both theoretical and policy discourse.

Keywords: demographic change; digitalization; climate crisis; welfare states; social risks

(责任编辑：郭 林)

① Matt Wilder, et al., "Eco-welfare States and Just Transitions: A Multi-method Analysis and Research Agenda," *Circular Ec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2024, 4(3).

② Choi Young Ju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olicy and Innovation in South Korea," in *a Research Agenda for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3.